

※文哲譯粹※

宋學之本質及其思想史上的意義

山井 湧* 著 任鈞華** 譯

前 言

文中「宋學」之語，是從「宋代儒學」的意義上來思考。即使宋學用「宋代儒學」一句話概括，其中仍有諸多因素交雜。一般來說，宋學始於范仲淹、胡瑗等人的實學，一方面包括孫復、歐陽修等人的春秋學與名分論，另一方面包含了周、張、二程所謂的道學。此外，集前人學問之大成的朱子的出現，還有道學別派的陸象山，以及被稱為事功學派的陳亮和葉適等等，也包含在宋學裏。文中的宋代儒學，也是以道學為主來思考，並把朱子當作研究的核心，想以此方針來解決問題。原則上，道學派和其他學派的關係，以及道學派中從周濂溪到朱子思想發展的情況，或二程異同、朱陸異同等等的問題，文中並不觸及。當然，這些仍是有必要去檢討的重大問題，但因時間上的關係，特別就道學，以朱子為思考中核，方能概括宋學全體之大要。至於理氣哲學部分的細節，在此無法深入探討，今後就交給今井宇三郎處理了。

從上述的立場，提出宋學的問題，並總覽歷來的研究成果，經整理之後發現有些問題曾被提出來過，分類如下：

此文譯自山井 湧：〈宋學の本質とその思想史的意義〉，收入氏著：《明清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頁3-21。原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作者在九州大學所召開的日本中國學會第十一次大會哲學部門討論會上的口頭報告，後經大幅修改而成。作者分「宋學如何成立」、「宋學為何」、「宋學後來的演變為何」等三大主題，一一介紹並檢討學界既有的論點，勾勒出二十世紀中葉日本的中國文、哲學界對宋學的研究概況。

* 山井 湧，前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 任鈞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一、宋學如何成立？

- A. 影響宋學興起的思想。
- B. 影響宋學興起的歷史性、社會性因素。
- C. 宋學的階級基礎。
- D. 宋學的先驅。
- E. 宋學精神的支柱。

二、宋學為何？

- F. 宋學的內容。
- G. 宋學的性質——特別是有關朱子學方面。
- H. 與其他時代儒學的比較（此項省略）。
- I. 宋學的社會角色。

三、宋學後來的演變為何？

- J. 與明學的關係。
- K. 與清學的關係。
- L. 作為官學的朱子學。

這個整理方法或許也有問題，但按照我感興趣的部分而試著蒐集、歸納，就成了上面的分類。以下依此分類，報告關於個別項目至今研究上所發表的見解，最後簡單說明自己對於宋學的看法，希望能提供討論的資料。

壹

一、宋學如何成立？

宋學形成的問題，從 A 到 D 的四個項目，在歷來的研究上，基本的共同理解大致完成了——儘管根據個別研究所提出的觀點不一，綜合那些觀點，仍有可能描繪出大體的輪廓——將之歸納說明如下。

A. 影響宋學興起的思想：

宋學之前的儒學，為一從事煩瑣、空虛字句注釋的學問，稱作「漢唐訓詁之學」，因而在思想層面上，佛教乃至道教比起儒教更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宋學否定以往的訓詁之學，欲闡明經書真精神，與佛教和道教相抗衡。宋學就以往儒

學所欠缺的佛、道思想，特別是以增補佛教所富有的理論層面為目的，建立了嶄新面貌的儒學。宋學在與佛、道抗衡的過程中，雖採取批判佛、道的立場，實際上則吸收佛、道思想進入自己的學說，借助佛、道之力以完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在此意義下，宋學被視為三教融合的結果。再者，為新儒學的形成帶來影響的佛教思想，如華嚴宗和禪宗，尤以華嚴哲學中的理事無礙論受到特別重視。

B. 影響宋學興起的歷史性、社會性因素：

第一，後漢以來的貴族政治約在唐代中期開始崩壞，之後歷經唐末、五代的軍閥統治期，到了宋代，在新式官僚制度的支持下，建立了君主獨裁政治。第二，以往作為階級基礎的貴族階級沒落，新式的封建地主取而代之，也就是雇用佃戶耕作土地的這類土地所有者階層出現了。這些人構成官僚階層，即所謂的士大夫階層，或言知識分子階層。此外，由於工商業發展迅速以及都市繁榮，市民階層（也就是都市裏的工商業者）變得富有，他們其中有人買了土地成為地主，使這個階層也加入了官僚，即知識分子。第三，宋代倍受北方民族遼、西夏、金的壓迫，不得不屢次締結屈辱的條約，而且，由於金的緣故，宋被迫南渡，最後終為元朝所滅。有宋一代，始終存在著這種與民族危機共存的特殊情況。

基於以上因素，作為新興地主階級之學問的新宋學於焉興起。宋學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也意味著佛教的出世主義和道教的脫俗主義無法應付當時民族危機，故回歸到屬於傳統思想且能處理現實社會問題的儒學上。我們可由此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除了上列因素外，促進學術文化勃興的主因，另有宋代的文治政策，優禮文官、儒學受到獎勵、科舉的實施等，令更多的新興地主階層成為官僚，知識分子階層擴大。施行印刷術、製版書籍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C. 宋學的階級基礎：

一般而言，宋學的階級基礎無非是指上述地主＝士大夫＝官僚＝知識分子的階層。

D. 宋學的先驅：

列舉宋學的先驅，唐代有韓愈、李翱等人。不過，與其說他們是宋學的先驅，

或許更應說，他們是宋學的萌芽。進入宋代，則有范仲淹、胡瑗、孫復、歐陽修等人。如果將宋學限定於道學，開山始祖首推周濂溪。宋學其他的先驅者還可以舉出很多，只是宋學的先驅到底該舉誰，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因此就先打住不談。

總之，由於以上的種種情況，宋學因而興起，普遍的看法是宋學的成立時期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十一世紀中葉）。

上述 A 到 D 四項，大致上為一般通論，然而在這一般說法之外，或許可就以上四項，依次列舉若干觀點再加說明：

關於 A 項，在陳鐘凡的《兩宋思想述評》裏可以見到除了道、佛的影響外¹，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西教」東漸，也影響著張橫渠、邵康節兩人學說的主張。

關於 B 項，首先小柳司氣太在《宋學概論》中提到²，宋代國運衰弱使哲學思想大為興盛，可計為宋學勃興原因之一。此說法或有其合理之處，然而他以「有道且廉潔的士人不見容於當世，所見所聞盡是生靈塗炭，因而藉由優美沉痛的文學與高深玄妙的哲學，發洩滿腔不滿以藉慰自己」的角度來看問題，其實並不能合理的說明宋學的全面勃興。

吉川幸次郎在〈近世中國的倫理思想〉中指出³：前代由於缺乏集中的政治力量，人民生活陷於混亂，價值標準因而呈現多樣化。當時，與儒家的「經」並列的老莊思想和佛教極具影響力，宋學意圖收拾此混亂狀態，實行回歸經書的運動。與吉川氏觀察角度略有不同，在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編著的《中國思想史》裏⁴，由市川安司執筆的「宋代」一項中指出：當時為求政治上統一的客觀形勢，而有了開始思考「陰陽」之上的「太極」，以及「氣」之上作為統一本體的「實在」（宋儒所言之「理」）的契機。

守本順一郎在〈朱子學的歷史結構——中國封建思維的成立及其特質〉（上）、

¹ 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編案：山井先生原文出版項採隨文夾註方式置於文中，為便利讀者查閱，編輯部統一置於註腳。

² 小柳司氣太：《宋學概論》（東京：目黑書院，1894年）。

³ 吉川幸次郎：〈近世支那の倫理思想〉，《岩波講座倫理學(21)》（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

⁴ 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中國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

(下)二文中提到⁵，大乘佛教，特別是華嚴宗的空觀代表了中國古代思維，朱子學乃逆轉了這種空觀的觀點而成立。根據守本氏的說法，大乘佛教的空觀為徹底否定自我、否定人的哲學，透過否定的途徑，絕對地也盲目肯定了現實。換言之，將現實之中有差別的世界視為虛幻，而本質上則是一個沒有差別、平等的真實世界。這個空觀並不是去批判，而是對現實原原本本的肯認。相對於大乘佛教的空觀，朱子所解釋的「理」，是以君臣間的「理」為基礎，認為「理」是所有人際關係中的上下尊卑關係，也就是名分作為「理」的具體內容。因此，佛教裏的空觀是無差別的平等觀，算是一種平面的理論；相較於此，朱子的理則肯定了上下之分，可說是階梯式的、垂直的理論。朱子一方面以「如依平面的理論將失上下之分」的說法來批判佛教；另一方面卻將佛教的理論、觀點加以逆轉，吸收進入自己的學說裏。守本氏這個看法的確耐人尋味，暫且不管他對朱子的看法，他如此解釋佛教是否恰當，我深表懷疑。另外，關於朱子，守本氏所指出的上下之分和階梯式的理論，其實普遍存在於古代儒家的思想裏。因此，這該如何解釋，也有疑問。而守本氏對於宋代封建制的特質尚有別的見解，容後再談。

至於 C 項，譚丕模在《宋元明思想史綱》中說到⁶，宋代小地主以及都市工商業者比大地主更具經濟優勢。關於宋學的階級基礎，譚氏進一步區分地主階級：周、張、二程及陸象山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哲學思想，李觀、王安石、陳亮、葉適代表小地主思想，而朱子則為大、小兩地主階層之調和。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看法大體上雖與譚氏相同⁷，不過他將葉適和陳亮視為初期市民階級的哲學。兩書的看法皆源於唯物史觀的立場，大致上區分方法正確無誤，可是這種貼上教條式標籤的方法，並不是經由精密分析所得的結論。即使在中國，最近的研究似乎也已不太用這種機械式的階層區分法。

E. 宋學精神的支柱：

這項與後面 G 項「宋學的性質」有重複之處，不過在此不是指宋學，而是指宋

⁵ 守本順一郎：〈朱子學の歴史的構造——中國における封建的思維の成立とその特質〉（上、下），《思想》第 354、355 號（1953 年 12 月、1954 年 1 月）。

⁶ 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上海：開明書店，1936 年）。

⁷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書局，1937 年）。

代一般的思想潮流、精神特色等作為宋學根基的思想狀況。關於這點，可從各種立場舉出很多事項，其中將共通事項整理成單一項目，可舉出：「復古的思想、尚古思想」、「自由批判的精神」、「客觀主義、唯理主義、合理主義、科學精神」、「理想主義」、「愛好理論」、「重靜」、「心理傾向、精神傾向、心較物優越」、「尊重道德的風氣」、「國家主義」等諸點。

那麼，就從上面總結出的要點裏挑出尚有疑義的事項，分析之。首先，相對於「客觀主義」的說法，也有主張「主觀傾向」的人，而上述「心理」的主張或許和主觀主義有著相通。這麼一來，凸顯上面兩個相反的傾向，意謂著宋代思想裏其實並存著相悖的因素。至於要把那部分當成焦點？我想依據不同的標準來看，就會出現不同的判斷。其次，很多學者已經指出，宋學裏所謂「自由批判的精神」是指不依前人注解，獨自對經書提出解釋。對此，佐中壯在〈宋學裏所謂批判性研究的開端〉一文裏，有不同的看法⁸。佐中氏以孫復與歐陽修為例來討論「自由批判的精神」，他認為這雖然是批判的精神，不過卻是真正自由的精神，而不只是想求得合理的解釋而已。但也如佐中氏自己所言，稱作「批判性」大致無妨。

還有一個與此項相關的「尚古思想」。前引吉川幸次郎的論文談到，宋學的尚古主義，首重最古的經書。之後經書的地位一直下降，而在宋代已至最底。因此，就有了回歸經書，想依據經書來解決現實問題的主張。重澤俊郎在《原始儒家思想與經學》裏也引用朱子的話來說道⁹：「只有真正的尚古主義者懷抱徹底的絕望感，而學者的任務與活動只是振起復古精神，以此儘可能找出減緩（經書地位）下降速度的方法。」本田濟的〈王禹偁——宋代思想史的一環〉引用了吉川幸次郎其他的論文¹⁰，談到了道學的道統思想中隱隱存在著下降感。他認為，復初的思想，就是把道統思想在時間的序列裏置換為復古思想，而且從一開始就抱著預測將失敗的絕望掙扎感。像他這種將復古思想乃至尚古思想合併以強調「下降感」的說法，比較有說服力。不過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卻有不同的說法¹¹，他指出了樂觀主義為宋學的一貫性質。上述的下降感和丸山的樂觀主義，並不是相吻

⁸ 佐中壯：〈宋學に於ける所謂批判的研究の端緒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54編第10號（1943年10月）。

⁹ 重澤俊郎：《原始儒家思想と經學》（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

¹⁰ 本田濟：〈王禹偁——宋代思想史の一環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0集（1958年）。

¹¹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

合，而實際上是相反的方向。至於要掌握這相對的層面為佳，並非易事。我們應當思考的是，宋學作為新興學問的鮮明特色以及學習聖人所為使自己有依恃、有信心等等層面，才合乎情理。在宋代（宋學者身上亦有）的確有一種末法意識，而且古文中的「文起八代之衰」，即意味著由此最低下的狀態回復到古代至上的地位。作為新興地主階層思想的新儒學，在此衰頹微弱的氛圍包覆下開始興起，一直到朱子將之集為大成，其過程著實令人難解。

二、宋學為何？

此為宋學本體乃至其性質的問題，觸及了「宋學本質」這個課題的核心。

F. 宋學的內容：

所謂「宋學」的範圍非常廣泛，有「經學」的層面和「史學」的層面。這裏所指的「史學」，與「經學」中的「春秋學」，關係特別深厚。還有和這些相關的「名分論」的層面，也有「政治學」的層面。此外尚有「哲學」、也就是「理氣心性之學」的層面，以及與此有關的「修養實踐之學」的層面。以上將宋學的內容劃分出六個項目，這六項是選取其中顯著的項目依序列舉。其實這樣的劃分，並不能明確區分出宋儒學問的動向。但總之宋學就包含了這些各式各樣的層面，至於該將這裏面那一項視為宋學最根本的層面？關係著我們如何思考宋學的本質。就這點而言，有兩種看法：一是如果把宋學當成義理之學，也就是哲學的話，那哲學就是宋學中最有特色的一面；二是哲學為實踐的基礎理論，簡單來說，可以把宋學當成是修養實踐之學。這兩種看法，皆被有力地陳述。而且，還有將兩者合而為一的想法，以及將宋學視為一種修己治人之學的觀點。前面所引的守本順一郎的論文，乃是局限於朱子學的討論，而全都回歸到名分論上來思考。至於前引吉川幸次郎的論文，則認為宋學是一種「回歸經書」的行動。宋學是個人生活與經書合而為一的呈現，所以就以回歸經書為目的，試圖與現實調和。我們可視為一種以經學為中心的看法。

G. 宋學的性質：

談論宋學的性質，可以舉出「實際的學問」、「追求平易簡單的學問」、「以實踐為目的」、「不單是理論，而是基於自得自信」、「長於爭辯短於實行」、

「輕視感情」、「從自由的立場批判經書，並試著自由解釋」、「捨棄形式上的學問，直接接觸經書之真實」、「思考現象內部的實質」、「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名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色彩」等等特點。

上面各個項目沒有一個能完全道盡宋學的本質，可以說，宋學的確有這些面向。其中「長於爭辯短於實行」的性質，道出了與道學先生式的形式主義相關的一面。這點似乎與上述「實際的學問」以下的各項內容有矛盾之處，也可以說，宋學其實並存著相反兩面的特質。因為宋學的範圍廣大，討論的角度和採取的標準不同，它的性質就會不一樣。

性質論中，與朱子相關的有：「規模龐大而完整的體系」、「合理主義、唯理主義」、「分析性思考」、「靜的傾向」、「不只於教學還包括宗教的層面」、「含有自然法則的思想」、「個人的個別性與主體性優越於天的絕對性」、「強烈的『分』與『別』意識」、「嚴肅主義」、「權威主義」等等事項（G項這裏羅列的事項，有一般較多的說法，也有特定之人獨自的見解，兩方面都包括。為避煩瑣，出處一概省略）。一開始所學的「規模龐大而完整的體系」，應該可說是朱子學的一大特色。就規模龐大這點而言，宇同在《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¹²，也稱朱子為「孔子之外第二位偉大的文化整理者」。也有人說，朱子以後的儒學全不出朱子學範圍，此說大致不差。「不只於教學還包括宗教的層面」，為木村英一在〈規範與朱子之學〉提出的評論¹³。

其次，很多學者指出朱子學「嚴肅主義」或「權威主義」的性質，不過在友枝龍太郎〈《詩集傳》中所見朱子的思想〉一文中可以看到相反的說法¹⁴。友枝氏正是根據《詩集傳》來討論朱子對於人情洞察與理解之深刻。從這來看，友枝氏的結論是，朱子的態度並不是一種背離人情世故、拘泥於道學的態度。這論點確實是今後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一般常說，朱子學中有強烈的「分」和「別」的意識，而這與所謂的大義名分論有關。關於這點，也有必要一併詳加檢討。

有別於上述，近幾年在中國學界，比起前述大地主思想還是小地主思想的問題

¹² 宇同：《中國哲學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

¹³ 木村英一：〈ツツテと朱子の學〉，《東方學報》（京都）第22冊（1953年2月）。

¹⁴ 友枝龍太郎：〈詩集傳をとほして見たる朱子の思想〉，《東京支那學報》第3號（1957年6月）。

而言，更是把關心朝向唯物論或唯心論，或是找出在傳統思想中唯物論的因素。宋學中，特別是張橫渠的思想為一唯物論哲學的評價已然出現。

H. 與其他時代儒學的比較：

本項在討論宋學的性質上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點。但有關這方面提出的意見並不多，而文中其他地方自然會觸及，在此先省略不談。

I. 宋學的社會角色：

以下所記幾乎全以朱子學為對象的討論，列記了幾個顯著的項目——

1. 宋代性理之學為國家主義服務¹⁵。
2. 朱子學為國家權威的保障¹⁶。
3. 朱子學肯定了君主制封建社會¹⁷。
4. 朱子學奠定了專制主義的基礎¹⁸。
5. 朱子學乃是在新興階級的外在權威之上（以經濟力為基礎）賦與內在權威的學問¹⁹。
6. 朱子學透過提高官僚的人格之途徑來教化人民²⁰。
7. 朱子學是宋代以後適合支配中國社會的思想體系²¹。
8. 朱子學適用於穩定的社會，反過來它也促進了社會的穩定²²。
9. 把朱子學當成一種君主絕對支配的體制與，官僚支配農奴合理化的思想體系，是錯誤的²³。

¹⁵ 西順藏：〈程明道的天理——性理學の理的性格〉，《哲學雜誌》第711號（1951年）。

¹⁶ 庄司莊一：〈陳亮の學〉，《東洋の文化と社會》第4期（1955年）。

¹⁷ 大槻信良：〈朱子の學問觀〉，《東方學》第10輯（1955年4月）。

¹⁸ 仁井田陞：《中國社會の法と倫理——中國法の原理》（東京：弘文堂，1954年）。

¹⁹ 山根三芳：〈朱子の倫理思想における權の意義〉，《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0集（1958年）。

²⁰ 木村英一：〈ツツテと朱子の學〉。

²¹ 同前註。

²²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²³ 阿部吉雄：〈宋明の倫理思想〉，《世界倫理思想史叢書・中國篇》（東京：學藝書房，1959年）。

10. 朱子否定大地主所有制，並倡導解放在此制度下被壓迫的農民²⁴。

這裏面值得注意的是，9、10 兩項與其他諸項持相反的見解。就數量上來說，宋學，特別是朱子學，被當作是「君主絕對支配的體制與官僚支配農奴合理化的思想體系」（據阿部氏所言）的說法很占優勢。針對此點，阿部氏認為這種看法是從現代思想的立場上顛倒了思想的歷史。對於朱子來說，現實裏的道德並不是「理」，理是矯正現實裏的道德之下所呈現的一種根本原理。另外，阿部氏還討論到，與其說宋學的大義名分論是從階級對立的意識上產生，倒不如說是在民族對立的意識中孕育而生。而友枝氏則提到兩點：朱子提出將地主對佃戶的支配、從屬的關係置換成兩者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根據經界的實施，在一君萬民的統治精神下揭發擁有大土地這類不對的行為，且計畫確立自營農民體制，此制並及於佃戶。這兩點的目的是，以此將人倫關係因階級分化而崩解的村落共同體回復到本來的面目。其結果則是否定了大土地所有制，進而解放受地主壓迫的民眾。

這種對立的看法很重要，不過，似乎雙方無論在論據上或理論上，都沒有充分展開，因此日後如何針對重點進行討論，實屬必要。

在 I 項方面，還有前引守本順一郎的論文，從與上述稍異的角度，將朱子學定位為支配農奴制度的理論。守本氏說到，前章所涉及的大乘佛教的空觀，是完全否定奴隸的自我與盲目地肯定現實的理論，因此相對於這個支配奴隸的理論，朱子學的名分論則是支配農奴的理論。這即是說，奴隸因為沒有人格，所以適用於絕對否定自我的理論；而農奴則與奴隸不同，他們有人格上獨立的基礎，能夠確保農奴之「分」的理論就有其必要。守本氏又說到，宋代封建社會中佃戶自主性的力量強大，因此地主依賴統一權力的程度較高，便無法形成典型的封建社會，而形成了王朝權力強大之獨裁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因宋代封建制度這樣的特性，朱子學裏上下的身分關係，除了君臣之分以外，只出現父子、夫婦、兄弟等血緣上的「分」。或許是在他文中並沒有明確地將地主對農奴關係上的「分」表示出來，對於這部分的理論，個人難以理解。

守本氏之說討論到思想與社會基礎的關聯，看來很有特色。但他的說明講得太漂亮了，令人深感不安。「空」的思想是古代的思維，不過從空觀上產生的否定自

²⁴ 友枝龍太郎：〈朱子の治民策——南宋村落の階層分裂と國家權力の問題〉，《東方學》第 17 輯（1958 年 11 月）。

我的理論只用於奴隸，我想這說法難以被接納。接著再從中世的思維觀點來看，五倫之分的說法並不是朱子獨自之說，這方面也有疑問。正如守本氏自己所言，這只是當成一種嘗試性論說的提出，今後尚待檢討之處還有很多。但不管怎麼說，這是篇值得注意的論文。

三、宋學後來的演變為何？

宋學對後世影響的問題，這裏很簡略地談一下。

J. 與明學的關係：

朱子學說的信奉者很多，直至後世仍不絕，因此一般以「朱子學派」稱之。相對於此，則把王陽明視為與陸象山的思想系統有關，稱之為陸王學，而這種說法幾乎已成定論。不過山下龍二在〈陸象山的心即是理說——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比較〉一文中卻對陸王思想的系譜懷著疑問²⁵。他覺得陸象山反而和朱子較為接近，而與王陽明不同。這個論點很有說服力，想必也有該檢討的問題存在。

其次，相對於「宋學範圍的廣闊，明學的範圍則單純許多」的說法，是誰提出，記錄上已經遺漏。不過，倒是指出了明學專門集中處理心的問題，而《京大東洋史（上）中國史》裏三田村泰助所著的〈獨裁政治的時代——思想與文化〉也有相同的意思²⁶。三田村氏認為明代的思想傾向，是專以內在的世界為其志向，對外界（政治）則毫不關心。楠本正繼在〈宋明兩代思想的糾葛〉與〈宋學的產生〉二文中就比較了宋學和明學²⁷，而列舉出「靜的——動的」、「歸依自然——尊重個人」、「在物象內部上建立本體——本體與作用如一」諸點。這些觀點是他經由對繪畫、瓷器等等的觀察，從這樣寬闊的視野加以論證。楠本氏說法我想大致上是對的，只是這種動的說法與上述三田村氏的說法形成怎樣的關係，也是個問題。雖然明代並非當前的課題，但對「動」的性質卻有必要更進一步來思考。

²⁵ 山下龍二：〈陸象山的心即理說について——朱子學・陽明學との比較〉，《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紀念論集》（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1959年）。

²⁶ 三田村泰助：〈獨裁政治の時代——思想と文化〉，《京大東洋史（上）中國史》（大阪：創元社，1953年）。

²⁷ 楠本正繼：〈宋明兩代思想の葛藤〉，《人文》第1卷第3期（1947年）；〈宋學を導いたもの〉，《東方學》第2輯（1951年8月）。

K. 與清學的關係：

清學與宋學有時代上的距離，我想這點不成問題。倒是探究朱子或朱子支派中的黃震、王應麟與清朝考證學的淵源，這樣的見解才比較有說服力。朱子的學問規模龐大，考證學的因素因而也包含在其範圍之內。如果依這說法來看，那的確是如此。但宋學和清學其實是不同的性質，所以將朱子和清朝考證學草率地歸為同類是有問題的。只是因為具有相同的因素，而說有淵源的話，那麼也可以從朱子往前回溯到更早。比起朱子來，有人舉出更早的歐陽修，還有從唐代開始回溯到漢代，道理上也行得通。如前引吉川幸次郎的論文中提到：「回歸經書」的思想，是到清末為止貫穿整個近世（宋——清）的理論。為了適應逐漸確立的知識階層，這思想靠著科舉而得到延續。不過經書和現實的調和有其界限，現實漸漸與經書無干，遂使經書失去了力量，到了近代就崩壞了。造成不探究道理的本身，而把「經」視為道理且一味地追求過去，因此，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吉川的論文雖然在觀點上受到局限，不過他以「回歸經書」這個貫穿的觀點為其思考核心，對於這次「宋學之本質及其思想史上的意義」的課題，倒也提出一個答案。在此意義上，這篇論文雖是有年代的舊作，仍值得注意。

L. 作為官學的朱子學：

朱子學在元代科舉考試下被採用為解釋經書的標準，而明代所編纂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更堅固地確立了朱子學的官學地位。因為這些緣故，朱子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現在因時間的關係，我簡單來談。朱子學中常說的嚴肅主義、權威主義、擁護君主絕對主義等，是朱子學成為官學，得以君臨思想界的重大原因（在日本的江戶時代也稱之為官學）。特別強調朱子學權威主義性質的仁井田陞，他認為朱子學「在元明兩代，也被當成是科舉的金科玉律，並奠定了權威主義的基礎，同時權威主義也擁護了朱子學」。仁井田氏的說法，還是著眼於朱子學作為官學的層面。朱子學之所以成為官學，是因為朱子本身的學說一定具備成為官學的因素。不過所謂朱子本身的思想與朱子以後的朱子學，其內容以及與社會的關聯性也各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加以區別清楚。

貳

以上就各問題點分別介紹了以往的學說。最後，個人對於這個課題，想簡單補充幾個看法。我這個外行人「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意見，無法顧及全面說明，只就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加以敘述。如果能多添加一部分討論的資料，實感榮幸。

首先，宋學是宋代新興地主官僚階級的思想。這點是前面 B 和 C 項裏提到對宋學的一般性理解，我想沒有問題。其次，宋學的本質如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是所謂的「修養之學」，如果對此再作一些補充，可以說修養之學是以理氣哲學的理論為其根據，而它的基礎在於經書，我認為宋學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另外，就修養之學稍作說明的話，可說這是一門思考人該怎麼樣、該如何做，並且將之實踐的學問。支撐這門學問的精神，一為據理好辯的精神——這個表現方法受到前野直彬氏的啟發頗多，不過在此是與以往的思考不同，建立獨自的見解來作辯解理由，指的是這般的精神態度——除了據理好辯的精神之外，我想再舉出某種的行動精神。說到前者，上述 E 項「支撐宋學的精神」裏所舉出的「愛好理論」，文學方面似乎也有，如青木正兒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就指出了宋詩的雅好辯理²⁸。宋代詩論特盛，確有其事。至於後者「行動精神」的部分，在程度上以及想法上，因人而異，因此有以此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有實踐於日常生活相關問題上的人，有將之用於心之修養、人格修養的人。道學家就屬於此類。這種自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與行動精神，成為新社會的指導階級，且是在北方民族壓迫、侵犯下的宋代士人階級所具有合理的精神。

至於性理學方面，也就是理氣哲學的理論，是為宋學的一大特色。因為理氣哲學的理論不過是修養的根據，而且只擔任這樣的角色，所以我們並不認為理氣哲學理論本身的完成就是宋學的目標。理氣哲學中的氣是指現實中人的姿態；而理則是從內在思考作為人所應有的正當姿態，而且是表達此正當姿態的原理。宋學為修養之學，因而強調重視修養的「工夫」，並且高揭主一無適、居敬窮理等工夫的口號。不過，工夫的理論並不重要，以身做工夫與實踐修養，這兩者才是最要緊的。總之，這類的修養構成了宋學的中心。程伊川對於胡瑗所問：「顏子所獨好者，何

²⁸ 青木正兒：《支那文學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43年）。

學也？」他回答說：「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伊川的回答，直截了當表現了宋學的學問形態。即使在知識的認識與理解方面上，「體認」一詞的使用以及豁然貫通的說法，表示了學問是如何與實踐緊密結合。

到了明代，將實踐修養的層面推至極端。明學的代表者為王陽明。就工夫的口號而言，由於朱子居敬窮理的「窮理」之知識層面，才得以完成條理分明的理論體系。這在王陽明身上卻成了「致良知」，而傾向於專就實踐的還有主觀的一面。因此，在王陽明的學說上，並沒有特別的理論存在。其後發展為將實踐修養和學問劃上等號，而且只注意心的課題，便失去進步的空間了。於是轉換方向，與心、與實踐等斷絕關係的清學便興起了。如一般說法，明末王學的末流流於「空疏」，作為反動的清學因而興起，其實並非如此。前項 K「與清學的關係」中所敘述的清學與宋學性質不同，就是這個意思。當然，即使在清代，宋學的修養之學也支配著當時學者們的精神生活，卻不是清代學者學問上所關注的對象。

宋學為一修養之學，那麼若以修養為主，總是會受到嚴肅主義傾向的影響。像朱子，他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性與情、天理與人欲各自區別開來，認定氣質之性、情、欲即惡之根源；而有就此克服情欲、變化氣質，以回歸本然之性這類修養論的說法。因此，不管怎麼說，宋學就是帶有嚴肅主義的傾向。但朱子並不認為氣質、情、欲這些全都是不好的，雖然他說克服情欲，不過不是那麼形式主義的嚴格態度。另外，常常為學者所指出的，理（天理）是一種具有絕對權威、拘束他人的規範，而這正是被稱為權威主義的原因。就朱子而言，即使談到理或天理，他並不是把理當成既成的規範，拘泥於現實，而是由自己發現、自我闡發的立場來解釋理為何物。至少朱子還留有那樣的餘地。可是在朱子以後的朱子學，卻成為學者自己發現理、確立理，而不是依循自己所立之理來修養行動的學問。對人們來說，既成之理已事先被確立好，也就是要他們面對此種具有權威的教條，被迫照著這樣的理來修養與行動。因此，朱子學被稱為嚴肅主義、權威主義的層面也就逐漸增強。朱子學成為官學之後，這樣的傾向又進一步變得更強了。

朱子本身的朱子學以及其後的朱子學，它們的本質，還有對社會的功能都有不同之處。如同前面所敘述，兩者之不同，必須要明確地區別。然而另一方面，朱子本身的學說後來成了官學，成為規範世人精神生活的教條，其權威一直持續到清末。朱子學本來就具備了成為官學的資格和可能，其後更成為必然。

以上的看法雖然並不全面，卻是我目前所能寫出的粗陋看法。

文末想要談的是，今後宋學研究的課題，到底在哪裏呢？其實到處都留有問題，也可以說這些全都是課題。這次回顧宋學研究史的結果，令人覺得目前最有必要探究清楚的是，宋學及其基礎的歷史性、社會性事實，兩者之間的聯繫。我想這方面的研究極為不足。最直接切入此問題點的是守本氏的論文，但遺憾的是，作者對於朱子學及其社會的基礎兩者結合的方法論不夠具體，該篇論文便不能說很成功。在這個意義上，友枝氏的論文〈朱子的治民策〉就很具體地表現出來，不過他所處理的範圍只局限於一部分，還不夠充分。今後，期望專門研治宋學的學者能從專家的立場，就這點採取更深入的剖析。最後的結果，必能明瞭宋學的本質以及宋學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補記】本稿為一九五九年十月，在九州大學所召開的日本中國學會第十一次大會哲學部門會議的討論會——主題是「宋學之本質及其思想史上的意義」。會議主持人是當時東京大學的教授阿部吉雄，報告者是東京教育大學的助教今井宇三郎和筆者——筆者一開始先將口頭報告的原稿，用修改的形式加以整理，而以印刷物的形式公諸於世。雖然這次就之前的原稿修改之處非常多，不過只是專就形式與表達方面作調整，實質的內容並沒有修改。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記）